

陈长文
著



明代 科举文献研究

Mingdai
Keju Wenxian
Yanjiu

山东大学出版社

明代科举文献研究

陈长文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科举文献研究/陈长文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607-3558-0

- I. 明…
- II. 陈…
- III. 科举制度—文献—研究—中国—明代
- IV. D69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5533 号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72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2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本书获鲁东大学学科建设
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时代呼唤“科举文献学”

科举制度始于隋唐，终于清末，在中国存在了近十三个世纪。这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等诸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以至于美国汉学家卜德(Bodde)在《中国思想在西方》一书中对它这样评价：“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①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则盛誉科举制度乃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②，近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奔走呼号为科举制平反，并为建立一门新兴学科——“科举学”而不懈努力。

“科举学”，至迟从北宋开始就有了这种提法。当时是指“科举之学”，即“应举或备考科举的学问”。刘海峰先生则是现代“科举学”的首倡者，始于他在1992年发表的《“科举学”刍议》一文。而后又陆续发表了《“科举学”发凡》、《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科举文献与“科举学”》等数篇带有建构性质的重要论文。2005年又出版了“科举学”的扛鼎之作《科举学导论》。他把“科举学”界定为“以科举为研究对象的专学”。历经十多年的孕育、萌芽、破土、成长，今天她已经成为学术界一道伟岸的风景。“科举学”已经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接纳和欢迎，日渐成为当今时代的一门显学。

本无“文献学”之名，人们把从事整理、研究古文献的工作称之为“校雠学”，所以校雠学乃文献学之别名。“文献学”这一提法始于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俩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文献学实际上包含了古籍整理、研究中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

① Derk Bodde, *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 Washington, D. C. 1948, p31.

② 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8期。

诸多方面的内容。

至于“科举文献”，骆兆平、沈登苗等先生曾有论述。刘海峰先生也于2003年在第32期《台大历史学报》上发表过《科举文献与“科举学”》一文，并在《科举学导论一书》一书中专辟一章——第十六章“科举文献论”。他认为“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历史的文献”^①，其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方法。笔者一向服膺刘海峰先生严谨创新、体大思精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

吾生也晚，吾学尤浅。笔者自1998年在河南大学师从牛建强先生攻读明清史硕士研究生以来，一直专注于明代科举文献，尤其是其中的核心部分——进士登科录研究。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明代科举中的时务策研究——以登科录为中心》。2003~2006年又到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龚延明先生研治中国古代职官、科举制度史。期间，龚先生又让我参加了他所主持的大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代登科总录”的子课题——“明代登科录”研究，进行资料的搜集、抄录、整理与输录工作。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对科举文献，尤其是明代科举文献接触较多。特别是最为珍贵的明代进士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同年录、履历便览、题名碑等原始文献，使我认识到这是一方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是一座尚未被开掘的金矿。笔者的博士论文《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被答辩委员会过誉为“了解和利用明代登科录的一把钥匙”，五名外审专家和五名答辩委员一致给予“优秀”等级。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主要内容大都在国内一些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且有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征引或全文转载过。

通过学习和研究，使我深深地认识到：随着“科举学”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国际化，亟需建立一门它的分支学科——“科举文献学”，或者说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

“科举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就很重视对资料的占有和研究。他曾经说过：“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②已故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就特别强调：“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名物制度认识的水平；而职官制度又是名物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它渗透在有

①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2页。

关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会生活的大量文字记录之中。”^①职官制度是这样，科举制度又何尝不是如此！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近得《晦庵先生同年录》（即《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因得以知宋科举之制。”^②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大昕认为《元统元年进士录》“于元史大有裨益，勿轻视之”^③。著名文献学家顾廷龙先生毕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清代硃卷加以搜集、整理和影印出版，他认为“硃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刘海峰先生也曾指出：“在浩如烟海的科举文献中，登科记、题名录、登科录、同年齿录、同年小录、科第录、科齿录、科名录、闱墨、朱卷等是核心文献……其史料价值早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公认。20世纪60年代，何炳棣在美国根据明清各科进士题名录所载数万名进士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率作过详细的实证研究，曾引起西方社会史学界的惊叹。最近也有学者通过朱卷的准确记载来考证发现一些人物悬而未决的籍贯和生年问题。”^④科举文献，尤其是原始文献是科举制度、科举史、科举人物等方面研究的基石。文献的匮乏，常常令我们束手无策。相反，文献的新发现、新整理、新阐释也可能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因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推动“科举学”的深入研究，必须从现存科举文献，尤其是原始文献——进士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同年录、履历便览、硃卷、题名碑等入手，而过去我们恰恰忽视了这种基础性研究。“科举文献学”制约着“科举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关于“科举文献学”的内涵，笔者认为：它是指研究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之学。它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也是“科举学”最基础的分支学科。

“科举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科举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各类科举文献，即关于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各种方式的文献记载。而科举文献又似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原始科举文献，即核心科举文献，是对科举考试制度、过程、内容、结果及相关人物、事件的原始记录。一方面包括科举时代各种科举考试诏令、试卷、金榜、各种试录（主要包括

① 龚延明：《官制研究的文献学意义》，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②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2页。

③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黄丕烈《题识》，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刘海峰：《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武举乡试录、武举录等五种)以及题名碑等为官方科举考试档案;另一方面还包括各种同年录(若按文武科,可分为文科同年录和武举同年录;若按级别,可分为贡士同年录、举人同年录和进士同年录;若按其本身的编撰体例,又可分为严格按年齿和兼顾方齿两类)、履历便览、硃卷(个人刊刻)、书牒等私家记述。第二层次:专题科举文献,即除原始文献以外的其他科举专门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关于进士、举人等科举名录的汇辑、剪裁与整理。以明清为例,如:《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类姓登科考》、《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等;(2)八股文、时务策、试帖诗等选本;(3)关于备考科举的专门书籍;(4)专门记载或研究科举的著作。第三层次:相关科举文献,即非独立存在的有关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记载的文献。这一领域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实录、起居注等相关记载;(2)隋唐以后历代正史《选举志》及列传中科举人物的记载;(3)历代政书中关于科举的记载;(4)一些类书中关于科举的记载;(5)历代方志中“进士题名”、“举人题名”等选举部分及科举人物的记载;(6)小说、诗歌、戏曲、笔记、文集中关于科举制度及科举人物的记载;(7)其他文献中关于科举制度及科举人物的记载。

“科举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研究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这里似应包括科举文献的刊刻、流通、皮藏、版本、目录、校勘、整理、研究、开发、利用、翻译及传播,等等。

“科举文献学”的研究目的和任务:作为“科举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为“科举学”(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研究提供最基础的史料支持,发挥好“基石”的作用。

“科举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要借鉴传统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诸如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等。另外,结合其自身的特点,还有它独特的研究方法。例如,考虑到历代各类题名文献及登第人员数量的众多,可以采用统计、图表等量化而直观的研究方法。考虑到原始科举文献,当时属于官方科举档案,今天大多已是国家文物,可以结合档案学、文物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考虑到试录、硃卷、选本或文集的大量科举范文都是优秀的文学之作,可以借鉴经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的方法。考虑到科举文献中大量家族史料,还可以效仿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等。总之,缘于科举文献内涵的丰富性和外延的广博性、多样性,对它研究的方法也应当多样化,应当具体而灵活。

构建、发展和完善“科举文献学”的时机已经来临。感谢古人,他们凭

借东方人所特有的智慧创造性地发明了科举制度,也为今天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科举文献,留下了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文献学的研究方法,留下了大量科举方面的研究成果。感谢今人,他们培养了大批科举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开创了“科举学”这一新兴学科体系,架起了打通学科分野的桥梁,影印出版了大量原始科举文献,创作了大量科举研究成果。感谢时代,当今已不是昔日政治左右学术的时代,而是实事求是、文化繁荣、学术自由的时代。我们理应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与时俱进,把“科举学”研究发扬光大,把历史的真实还给历史,并从历史中为现实指引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题名为《明代科举文献研究》,其实感觉有点儿大,若名之曰《明代科举题名文献研究》,或许更为贴切。考虑到笔者十余年来一直专注于明代科举文献,并试图在“科举文献学”方面能够做出一点努力,姑且以此名之。另外,关于“科举文献学”研究的意义、内涵、对象、内容、目的、任务及方法等观点,多年来虽常琢磨,然而还很不成熟,笔者旨在唤起学界同道共同构建一种新的学科体系,其中定有很多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敬请学界前辈和同好批评指正,将不胜感激之至!

最后,借此机会,衷心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的牛建强先生、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的龚延明先生和博士后导师山东大学的晁中辰先生,感谢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殷殷期待,使我走进了这座神圣的学术殿堂。衷心感谢朱瑞熙、何忠礼、李世瑜、刘海峰、郭培贵、钱茂伟、吴宣德、沈登苗等诸位先生以及我的师兄多洛肯、毛晓阳和师弟邱进春等诸位博士,感谢他们无私的帮助、点拨、批评和指正,使我有今天的进步。衷心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在百忙之中为我修改、校订书稿,他们那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工作态度使我受益匪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衷心感谢父母、姐弟、妻儿,感谢家人给了我精神上的莫大鼓舞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

拉杂如此,是为序。

陈长文

2008年3月3日于鲁东大学南苑



目 录

上编 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

- 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 (3)
-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原始性与权威性…………… (10)
-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度藏…………… (29)
- 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与其他版本之比较…………… (48)
- 进士登科录探源
- 兼与傅璇琮先生就“金花帖”问题商榷…………… (56)
- 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藏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述论…………… (67)
-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 (78)
-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刊刻、流布与珍藏…………… (87)
-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 (96)
- 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117)

中编 其他科举文献研究

- 进士登科录与方志《进士题名》…………… (127)
- 简评明代进士同年录…………… (135)
- 《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 (147)
- 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问题…………… (154)
- 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立石年代考…………… (158)
-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 (180)

下编 明代科举专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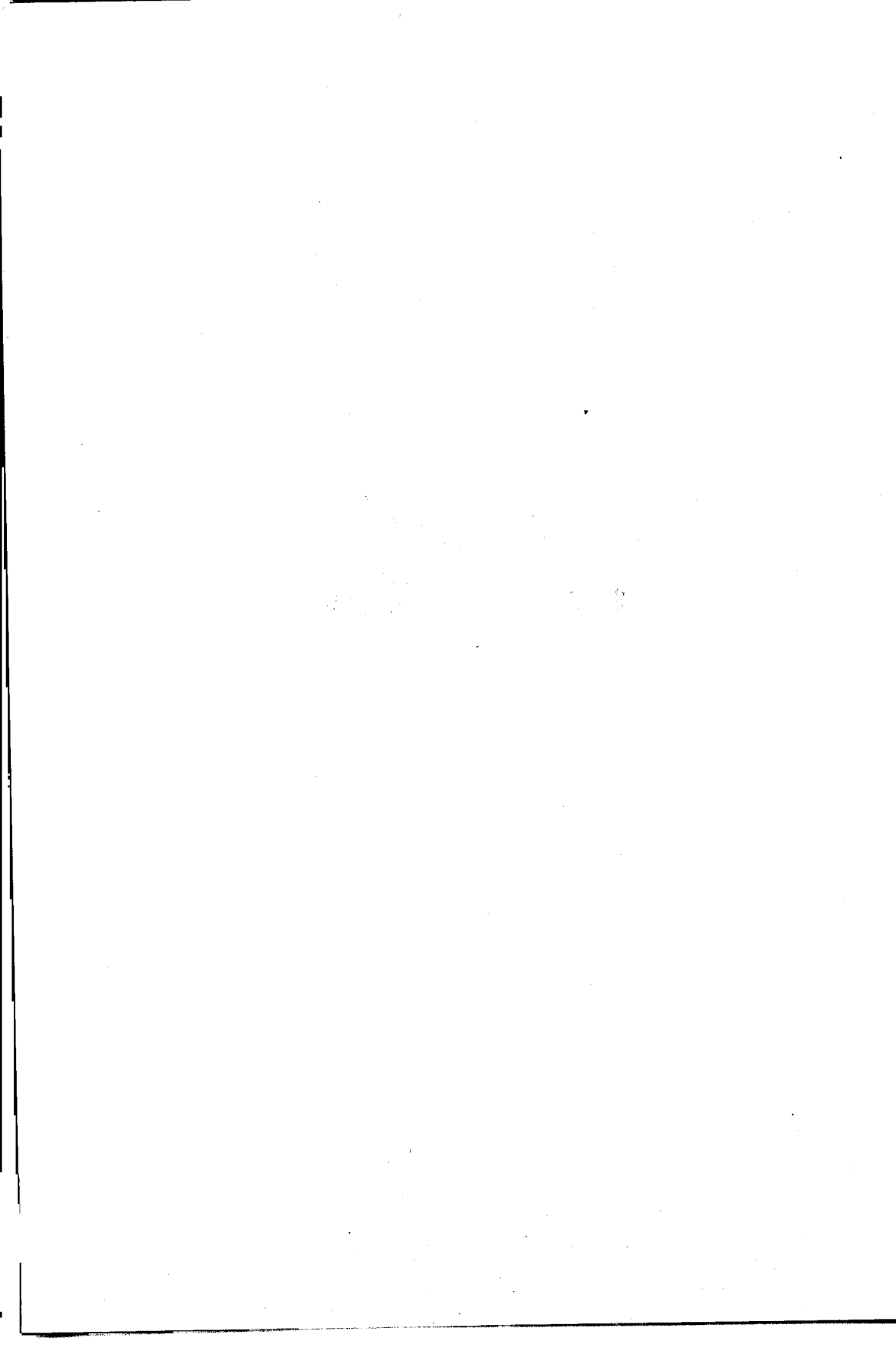
- 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实
- 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的立石问题…………… (191)

明代科举文献研究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197)
明代科举中的“告殿”现象·····	(220)
明代殿试“时务策”研究	
——以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245)
明代进士的姓名及婚姻	
——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的考察·····	(272)
明代殿试日期的变更及其原因	
——兼谈放榜及相关恩荣活动的日期·····	(279)
明代同名异地考录·····	(292)

上 编

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



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 的意义及现状

一、研究意义

科举制度起于隋唐,讫于清末,在中国存在了约十三个世纪。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但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以至于美国汉学家德克·卜德(Derk Bodde)在《中国思想在西方》一书中对它这样评价:“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①厦门大学刘海峰先生则盛誉科举制度乃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②,近年来以他为代表的学者在科举制度废除百周年之际奔走呼号为科举制平反,并为建立一门新兴学科——“科举学”而不懈努力。

事实上,科举制度历经唐、宋的发展、完善与规范化,至明代已经达到极致。按照史源学的观点,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推动明代科举制度的深入研究,必须从现存明代科举考试的原始文献——进士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同年录、履历便览等入手。刘海峰先生也曾指出:“在浩如烟海的科举文献中,登科记、题名录、登科录、同年齿录、同年小录、科第录、科齿录、科名录、闱墨、朱卷等是核心文献……是当时官方编印的载有及第者三代或五代以上祖先的文献,其史料价值早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公认。20世纪60年代,何炳棣在美国根据明清各科进士题名录所载数万名进士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率作过详细的实证研究,曾引起西方社会史学界的惊叹。最近也有学者通过朱卷的准确记载来考证发现一些人物悬而未决的籍贯和生年问题。”^③因此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

① Derk Bodde, *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 Washington D. C., 1948, p31.

② 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8期。

③ 刘海峰:《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究明代人物、科举制度的第一手资料，而过去我们恰恰忽视了这种基础性研究。

进士登科录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宝藏。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来，人们对它从几乎全盘否定到理性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多从宏观上进行理论性的研究，出版了一些科举方面的学术专著。相反，对科举制度进行微观的深入研究还很不够。如科举考试的流程，考试的内容，考官的选任，与科举考试相关的一系列礼仪，进士的姓名、字号、行第、籍贯、所治经典、婚娶、乡试情况以及其曾祖、祖、父三代情况等等，长期以来人们很少关注。我们知道，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分析研究它的细胞——“商品”开始的。我们也应当重视解剖麻雀的方法。只有重视微观研究，才能在归纳的基础上探求普遍的客观规律。每一科明代进士登科录都是科举制度留下的实物例证。明代进士登科录，作为记载明代科举考试的原始文献，它通常包括“玉音”、“恩荣次第”、“进士家状”、“皇帝制策”、“进士对策”五部分。对于研究明代进士人物、明史、科举制度史等有着无可比拟的价值，是其他任何科举文献所无法替代的。目前存世的宋代《登科录》仅有两科：绍兴十八年王佐榜和宝祐四年文天祥榜。而清代虽晚于明代，保存下来了大量清代朱卷，但进士登科录流传下来的相对较少。明代，因当时的藏书家像著名天一阁主人范钦等人的刻意收藏而使大量明代登科录得以流传至今。

目前学者对进士登科录的研究尚处在文献介绍、影印整理等初级阶段。仅有个别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利用，但仍显得较为肤浅。至今国内外尚无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地论述进士登科录的学术论著问世，甚至连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进士登科录的单篇学术论文也没有。故笔者不揣浅陋，撰成博士论文——《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就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源流、传播、刊刻、版式、结构体例及其本体内容，诸如“告殿”现象、“官年”现象、时务策、姓名、役籍、婚姻状况等进行具体研究，同时探究其文献价值及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此外，笔者还就明代进士登科录与其他科举题名文献，诸如同年录、履历便览、进士题名碑、（清）李周望《国朝进士题名碑录初集·附明洪武至崇祯各科》（以下简称《碑录》）、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清）盛子邺《类姓登科考》以及方志中的明代《进士题名》等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人们对明代进士登科录有个全面的理解，从而在明史、明代人物传记和中国科举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发挥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研究现状

对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研究和利用,可以追溯到明代。诸如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和张朝瑞《皇明贡举考》以及在此二书中多次提到的当时极其流行的《登科录类刻》、“闽本”、“湖本”、“俞振才本”等,但他们仅是把明代历科进士登科录进行了汇总、整理和剪裁。此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及《续编》中所选方志皆为明代刊刻,其中的《选举》部分皆有《进士题名》,也多参照明代进士登科录。清初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和李周望《碑录》,仍旧是对明代进士登科录的重新汇集和剪裁,只是体例不同而已:前者按姓氏,后者依科年。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利用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清代末科探花商衍懿在其专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第七节“乡会试之登科录、试录、同年录等”中提及了登科录、试录、同年录的一些情况,但他似乎并没有经眼过明代的乡试录、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仅据《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作了非常简略的说明。^①1969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了《明代登科录汇编》一书,共22册,包括台湾“中央”图书馆和原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影响。明代各类登科录66种,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80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朱保炯、谢沛霖编撰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②。该书参考利用了若干科进士登科录对《碑录》进行订补,但令人惋惜的是它对明清现存进士登科录的利用极其有限。天一阁学者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③和李大东《进士题名校勘记》^④等数篇文章对天一阁所藏明代登科录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尤其是骆兆平一文,对现存明代登科录的庋藏情况有个大概统计,为学者提供了不少方便。此后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些存世的珍贵原始科举文献。如万明的《北京图书馆藏四种明代科举录》^⑤和稍后周绍良的《明万历四十七年〈会试中式题名〉》^⑥。这两篇文章对数种登科录文献进行了介绍,并与《明史》、《明代历科进士题名录》中的相关记载作比较。沈登苗《也谈天一阁

① 商衍懿:《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5页。

②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 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载《文献》1984年第20辑。

④ 李大东:《进士题名校勘记》,见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

⑤ 万明:《北京图书馆藏四种明代科举录》,载《文献》1985年第1期。

⑥ 周绍良:《明万历四十七年〈会试中式题名〉》,载《文献》2002年第4期。

藏明代登科录——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①，始就登科录(包括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武举乡试录、武举录这五种试录)的概念、内容和实质等问题进行了概述，并着重对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科举文献”、“科举题名录”、“登科录”是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使用时应当慎重。此外，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一文利用了明代成化二年(1466)、五年、嘉靖十四年(1535)、万历三十五年(1607)等科进士登科录来证实明代商人户籍问题。作者认为“记载明朝科举新贵，即高中进士的学子姓名、地贯、役籍、出生年月、所攻学业等内容的《登科录》(又称《同年序齿》)，是一部官方认定的，记录、保留进士户籍较全面的珍贵史料”^②。钱茂伟《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史料价值》一文也利用若干科明代进士登科录及履历便览等，对明代29位史学家和3位藏书家的生年进行了订补。^③但惜其尚未认识到明代进士登科录中存在“官年”现象，即虚报年龄的现象，故其订补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商榷。陈智超在《〈美国哈佛燕京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导言》中说他为了考证这些人物，其一就是利用了明代进士题名录及登科录。因为这些文献“不但提供了写信人中曾举进士的材料，也有进士的兄弟及家庭的材料”^④。笔者《〈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⑤一文利用较多的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现行工具书《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行了多方面的校误，另外一篇《〈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利用诸多进士登科录等文献对《明史》中个别人物的进士登科年代进行了考证。^⑥吴宣德《〈明代进士题名碑录〉成书小考》一文，认为当年“李周望不可能完全按照碑上的题名来编辑《碑录》”，至少还参用了登科录。^⑦以上这几篇文章表明学者已经开始具体运用明代进士登科录来考证人物、史实和文献。

近年专著主要有：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⑧一书利用了台湾影印出版的《明代登科录汇编》中的明代登科录资料，从微观上探讨了明代

① 沈登苗：《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

② 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③ 钱茂伟：《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史料价值》，载《历史文献研究》1999年第18辑。

④ 陈智超：《〈美国哈佛燕京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导言》，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⑤ 陈长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⑥ 陈长文：《〈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⑦ 吴宣德：《明代进士题名碑录成书小考》，载《明代研究通讯》2004年第7期。

⑧ 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